

拉达克王国 :公元 950-1842 年(一)

——拉达克的早期历史

[意]L·伯戴克 著

扎 洛¹ 译 , 彭陟焱² 校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北京 100081 2.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有关 10 世纪拉达克王国诞生之前的资料很少。本文试图挖掘一些与拉达克有关的现有资料 ,而不是花时间以驳斥那些早已被推翻的无稽之谈。

关键词 :拉达克 鞑靼人 巴尔蒂斯坦 吐蕃

中图分类号 :K28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09)02-0012-05

编者按 :

意大利藏学家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所著《拉达克王国 :C.950-1842 A.D.》(1977 年 ,罗马)是关于拉达克历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是迄今为止有关拉达克历史的最权威著作。该著以《拉达克王统史》及其他数十种藏文文献为主要资料 ,同时又充分吸收了拉达克史研究的奠基者福兰克(Francke)、坎宁汉姆(Cunningham)等前人的研究成果 ,对拉达克地区的历史做了系统的论述。作者利用多文种资料 ,校勘印证 ,钩沉订误 ,使拉达克历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拉达克史研究属于西藏古代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但由于各种原因 ,国内有关拉达克史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我们提高藏学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本刊将从本期开始连载由扎洛、彭陟焱节译的《拉达克王国 :C.950-1842 A.D.》 ,以激励国内学界对拉达克史研究的关注。

有关拉达克王国诞生之前(10 世纪)的资料很少。以下内容就是试图挖掘现有资料 ,而不是花时间去驳斥那些早已被推翻的无稽之谈^[1]。

如我们所知 ,拉达克人口中的最早部分 ,是由鞑靼人(Dardis)构成的 ,在这里仍能发现他们的遗迹^[2]。无论种族根据还是地名学都显示 ,其中鞑靼人的成分非常突出。因此 ,我们可以推断任何有关早期鞑靼人的资料对我们研究拉达克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希罗多德(Herodotus)两次提到名为达迪卡伊(Dadikai)的民族 ,第一次(《历史》第三卷 ,第 91)

是与健达里欧伊人(Gandarioi)同列在波斯省区的列表清单中 ;另外一次(《历史》第 7 卷 ,第 66)是在薛西斯(Xerxes 或译为克谢尔克谢斯)国王的军队入侵希腊的历史中提及 ,在那里达迪卡伊人与健达里欧伊人在薛西斯的指挥下多次并肩作战。也许我们可以据此认为这是对鞑靼人的最早提及 ,而他们是生活在健陀罗北部及西北部 ,然而所有这些都还不确定。^[3]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历史》第三卷 ,第 102)我们还发现了第一个有关内陆亚洲有名的掘金蚁的传说 ,这是一则曾经引起许多争议的神话。再次

[收稿日期] 2009-01-12

[作者简介]扎洛(1969-) ,男 ,藏族 ,青海兴海人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所长助理 ,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与文化。

提及该神话的是亚历山大大帝 (ap. Strab. p. 705) 的上将尼阿卡斯 (Nearchus)。二十年后 , 麦伽塞因斯 (Megasthenes) (残片 , 1 ap. Strab.

p. 706) 把这些黄金拥有者与鞑靼人 (Dardai) 联系起来。在公元 1 世纪 , 普林尼 (Pliny) 认为鞑靼人是伟大的黄金制造者 (《自然史》, 67 *fertilissimi sunt auri Dardae*)。对此问题最为详尽的陈述仍属赫尔曼 (Hermann) , 他在辩论中指出 , 这则传说完全可以追溯到一些在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 (Baltistan) 特别是卡格依尔 (Kargil) 的淘金的知识^[4]。在公元 2 世纪 , 托勒密 (Ptolemy) (1, 41) 把鞑靼人 (Daradrai , 或译为打拉特雷) 的居住地定位于印度河的源头或上游地区 , 但没有提到黄金。在后来某个时期 , 我们发现鞑靼人 (Darada) 的名称出现在《往世书》(Purāṇas) 的地理详表中^[5]。

从人类学角度来衡量 , 现代拉达克人是一个混血种族。其主要成分为鞑靼人 (Darsic) (印地 - 伊朗人种) 和藏族人 (蒙古人种)^[6]。鞑靼人地区的民间传说也保存了整个拉达克早先被他们占领的传说。^[7]

最早对政治史的关注当属立在印度河卡拉泽 (K 'a- la- rtse) 桥旁的著名的沃韦玛卡德提萨 (Uvima Kavthisa , W im a Kadphises) 的卡罗施蒂 (Kharo[s] [t]hī^[8]) 碑刻。它被断代为并不确定的 184 年或 187 年^[9]。这牵涉到了恼人的贵霜王朝 (Kushana , 古译为羯霜那国) 的历史年表问题 , 在此不再讨论。无论如何 , 这则碑文证明了在公元 1 世纪或 2 世纪 , 下拉达克是在贵霜帝国的版图之内。

在拉达克被发现的诸如布拉合密 (Brahm ī) 和卡罗施蒂碑刻 , 大多只有一些词汇 , 我们仍局限于 70 年前由福兰克 (A H Francke) 出版的简短而非学术性的评论。^[10]它们提供了一些显然是通过克什米尔、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证据。

中国的朝圣者对我们的主题贡献甚微。法显 (Fa-hsien) 没有经过拉达克 , 甚至也没有从其周边地区经过。根据《释迦方志》、《唐书》, 玄奘 (Hsü an- tsang) 依据传闻描述了从屈露多 (Ch' ü - lu - to , 即 Kulū ta Kulu) 到洛获罗 (Lo-hu- lo , 即拉合尔 , Lahu) 的旅程 , 然后进一步道 : “此北二千余里 , 经途艰阻 , 寒风飞雪 , 至秣罗娑国” ; 原注称 “(秣罗娑 Mo- lo- so) 亦谓三波诃国 (Ssn-po-ho)”。在别处他又说苏伐剌拏瞿咄罗国 (Suvar[n] jagotra) 的国界西接三波诃国^[11]。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 这一地区毫无疑问就是拉达克。但是这些名称也提出了一些语言学上的困难 , 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个简短的讨论。

在古代 (公元 7 世纪) 把秣罗娑发音为 *muât-*

lâ-sâ。富兰克以前认为这个名字指代藏语中的 *Mar-sa* , 即 “低地” , 同义于 *Mar-yul* , 这是拉达克最常见的称谓^[12]。伯希和 (Pelliot) 接受了这种对等的说法 , 但是又提供了 **Mar ā sa* 和 **Mar ā sa* 两种选择^[13]。依我之见 , 以藏语的 *Marsa* 称拉达克之名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 , 这种称谓暗示 , 在 7 世纪早期的拉达克所讲的语言是藏语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成立的 , 但并不是说没有一点可能。其次 , 玄奘的发音系统是一个严格而合理的系统 , 对其来说 “罗 (*lo, lâ*)” 对应为 *la* 或 *ra* , 而非其他 ; 在他的整部书中 , 没有 “罗” 对应 *r* 的实例 , 只有一个例外 , 就是把 *Kar[n] asuvar [n]a* 写成羯罗拏苏伐剌那 (*Ka-lo (lâ)-na-su-fa-lo (lât)-na*) ,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太规则的翻译。他通常在布剌拏 (*Po- lo (lât)-na=P ū r[n] a*) 中把 *r* 翻译为剌 (*lo* , 古为 *lât*)。最早称为 **Mar ā sa* 是可能的 , 因为起初玄奘将 *Malaku [t]a* 翻译成秣罗矩吒 (*Mo (muât)- lo-ku-ch' a*) , 将 *Malaya* 译成秣剌耶 (*Mo- lo-yah*)。因此 , 我建议在 **Malasa* 和 **Mar ā sa*、**Mar ā sa* 中做一个选择。

三波诃 (古为 *sām-puā-xa*) , 转写 **Sa[m] paha* , 仍令人费解^[14]。

玄奘的苏伐剌拏瞿咄罗国 , 又为 *Suvar[n] abh ū m i* , 亦即著名的女国 (克什米尔古籍中称为 *Str ī rā jya*)。但此问题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我们也许可以认可图齐的观点 , 他通过对《无垢光所问经》(*Vimalaprabhā-parip[ṛ]ccha*)、对玄奘著作中所包含的成分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后 , 得出结论认为 : 在 7 世纪初期印度人 (在印度的中国朝圣者随之) 已经知道一个叫象雄 (*Žang-žung*) 的王国 , 或至少了解其南部地区^[15]。

我们因此辟出另一个研究途径 , 然而也使我们进入一个不太可靠的领域。《敦煌大事记年》记载 , 719 年 , 吐蕃政府 “展开了一次对象雄和 *Mar(d)* 的人口普查”^[16]。本教著作经常使用 *Žan-žun sm ar* 的表述方式^[17] , 这与两次在《赞普世系》中出现的 *sm ar Žang-žung* 是相同的。这已表明这个 *sm ar* 与藏语 *Mar* (即 “低地”) 毫不相干 , 而是一个专有名称 , 是对象雄的修饰词^[18]。也许纯属巧合 , *mar* 在象雄语中乃 “金子” 之意^[19] , 这似乎可以解释《敦煌大事记年》中 *Mar(d)* : 黄金之地 *Mar* , 即 *Suvar[n] abh ū m i* , 乃是象雄之一部分。当然 , 《敦煌大事记年》把象雄和 *Mar* 列为不同的国家是不准确的。

在这一点上 , 把 *sm ar* 和 *Mar* 列为一组、把 **Mar ā sa* 和 **Mar ā sa* (即拉达克) 列为另一组 , 指出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相似之处是比较公允的 , 但这也可能是一种巧合。无论如何 , 这些新因素即使对

我们澄清问题并无多少帮助,我也仍感受束缚。

在8世纪,拉达克卷入了吐蕃从东部向西扩张、推进与唐朝从中亚通过山口向南部逼近的相撞之中。吐蕃向西的推进已于634-635年开始,这是象雄首度承认吐蕃为其宗主国的时间,653年,吐蕃在此地委任了一名藏族地方长官,制度化的管理始于662年,677年曾发生了反叛,显然并未成功。719年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724年重新组织了管理体系^[20]。在地缘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吐蕃任何更进一步的向西推进都必须以兼并象雄作为先决条件。

就在同一时期,印度河上游的峡谷地区经受了一些中国唐朝政治影响的压力,因为在696年,大勃律(great P' o- lü, Baltistan)国王派一名使者前往中国表示臣服。717年,这位国王收到了中国政府的封赏,719年,他又派一使臣前往中国表达谢意。720年,其继任者受到了中国皇帝的封爵^[21]。顺便提一下,让我们关注这两位国王的名字都是印度语,这也表明巴尔蒂斯坦在那时通过吉尔吉特(G ilgit)或克什米尔亦或二者兼具,受到了来自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

不久后,巴尔蒂斯坦的统治者就改变了这种立场,这一事件的日期可以精确地确定下来。当720年后没有使臣到中国去朝见时,我们了解到在721年“上部地区(stod-p 'yogs,泛指西藏西部)”派使臣去拜见吐蕃赞普^[22]。在722年,中国人前去帮助小勃律(P' o- lü, Gilgit)王,因为他的王国受到了来自吐蕃的威胁^[23],这意味着大勃律王国已经成为过去,而归入了吐蕃的统治之下。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追溯到720年或721年。在那时,大勃律国或许已经包括了拉达克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如果它没有扩张那么远,我们仍可以猜测拉达克的臣服稍稍先于巴尔蒂斯坦。

对那时的形势描述较为清晰的是慧超,一位在727年从印度到中亚游历回国的中国朝圣者。他似乎对拉达克的知识有点模糊不清,或许拉达克就是属于大勃律国。“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风并别。……地狭小,山川极险。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若是已东吐蕃,总无寺舍,不识佛法。当土是胡,所以信也。”^[24]

从这则传说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三个结论:1、727年的拉达克,假如属于大勃律,那么就是以西藏为其宗主国。2、佛教在该国繁荣发展。3、当地居民为“胡人”。在8世纪,“胡”一词是与中亚的伊朗人相关联的^[25],但它的使用是随意的,根据慧超

的使用,它大体上是指伊朗人,这应该是与拉达克的鞑靼人恰好吻合(但不是象雄人)。所有这三条信息与上文的独立论证是一致的。

从他们在巴尔蒂斯坦的基地出发,藏族人在737年发起了反抗小勃律(B ru- za Gilgit Little P' o- lü)王国的斗争,小勃律向唐朝求助,且被答应并在青海湖(K ukunor)地区进行了一次阻击。这次阻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并没有挽救该国王,小勃律国王被打败,并且被迫向西藏朝贡^[26]。

唐军统帅高仙芝(K ao- H sien- ch i)在小勃律国英勇战斗,威胁到了吐蕃在遥远西部地区的控制,但并未被摧毁,但它的目的和成果在于,重新开辟了唐朝的中亚地区与当时(747)唐朝的同盟克什米尔地区间的直接交流。巴尔蒂斯坦没有被直接卷入,因为主要通道直接从吉尔吉特通向基申甘加(K ishenganga)峡谷到达克什米尔。但是唐朝并未重视途经佐吉拉山口(Zoji- la)到更远的路线,高仙芝向小勃律王解释,他并不是想征服这个国家,而主要是为了寻求一个通向大勃律的通道,尽管国王的反抗在武力威逼下失败了,但是唐朝将军并未进军到达巴尔蒂斯坦^[27]。

问题依然存在,在749年,吐火罗(Tokharestan)的叶护(yabghu)向唐朝进言,远征大勃律以打通这一通道。这一建议被采纳了^[28],但没有立即付诸行动,只在753年,高仙芝的继任者封常清(F ê ng Ch' ang- ch' ing)作为安西(中亚)节都使进行了一次对大勃律国的远征,通过突袭其首都贺萨劳(H o- sa- lao)而取得了胜利^[29]。我们不清楚这支远征军是否对拉达克产生了影响。不管怎么说,这是王朝军队最后一次出现在该地区。高仙芝在怛逻斯(Talas)河边抵御葛逻禄(Qarluqs)和阿拉伯(大食)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751),唐朝很少再有能力来控制这一区域了,在随后的40年中,它逐渐丧失了对整个中亚的占领。这样,在760年,我们就又了解到“上部地区”的一个使臣去朝见吐蕃赞普,并向其进贡^[30]。另外,从759到764年,一直居住在健陀罗(Gandhara)的唐朝的使臣(和后来的僧侣)悟空(W u- k' ung)指出,从克什米尔一条向东的线路可以进入吐蕃,另一条向北的线路可到勃律^[31]。东线进入吐蕃只能是佐吉拉山口,这表明当时的吐蕃领土囊括了普兰(Puring)和拉达克。

在8世纪下叶和9世纪上叶,拉达克极有可能是吐蕃的附庸国。这种情况似乎与《世界境域志》(Hudūd al- 'Ālam)中描述的一样,这是一篇在982或983年写的地理学论文,它主要以9世纪的(亚洲中部)内容为其来源。其中提到一个勃律吐蕃

(Bolorian Tibet, 似乎是 Baltistan Bolor = P' o- lü), 那儿的人民主要以做生意为主, 他们住在帐篷和简陋的棚屋中^[32]。这种贸易一直在拉达克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世界境域志》, 我们可以增加距离班公湖(Pangong lake)西面几英里的章孜(D rangtse)地方, 显然是由这里主要是信奉基督教的粟特人(Sogdian)商人刻在的巨石上的一些聂斯妥里派(Nestorian)的十字架来作为证据。而在同一地点, 还发现了一个简短的粟特人的墓铭, 它保存得不太完好, 没什么重要价值。我们从中仅知道: 这是一位来自萨马尔汗(Sam arkand)的商人于 210(?) 年雕刻的^[33]。不管怎么说, 这也提供了一个在这个边远地区 9 世纪和 10 世纪期间繁荣的商贸活动的明证。

在那一时期, 拉达克人生活中的主要文化构成来自于克什米尔。克什米尔佛教深入渗透于佐吉拉山口一带, 正如在德拉斯(D ras)和奇格坦(Chig-tan)可追溯到公元 700-1200 年间的萨热达文(Sc 上斜撇 ˘ arada)墓铭上所写的那样^[34]。德拉斯的雕塑和墓铭是非常重要的, 但它们从来没有被正确的对待过^[35]。

842 年, 吐蕃王国崩溃后, 西藏的宗主国地位很快就丧失了。就我们所能知道的是, 大约在 900 年, 仍以讲鞑靼语为主的拉达克人再没有与西藏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 至多还保持着一些贸易关系。拉达克的藏化开始于那时之后, 我们即将目睹在古老王朝的一个分支首领领导下, 从西藏中部的迁徙工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我们可以在这里引用一些例子。托勒密将“达巴斯(Dabasai)”与“卫(dBus)”(西藏中部)、“巴尔泰(Byltai)”与“巴尔蒂斯(Baltis)”等同起来, 在语义学和历史学上都是不可能的; 见伯戴克《拉达克史笔记》LHQ, 1948, 第 214 页。福兰克(Francke)关于“门(Mon)”人的先祖先到鞑靼再迁入拉达克是缺乏坚实基础的。见伯戴克《拉达克王统史研究》, 加尔各答, 1939, 第 99 页。而中国朝圣者继业(Chiyeh, 约 966)从摩揭陀到磨逾里(Mo-yü-li)越过喜马拉雅到桑耶寺和中亚的旅程并没有经过拉达克, 而是假道西藏中部的寺院桑耶寺。见伯戴克《拉达克史笔记》LHQ, 1948, 第 217 页。

[2] 在下拉达克的汉努(Hanu)和莫罗尔(Morol)之间发现了一个小的说鞑靼语的飞地, 其中心位于“达 mDa' (Da)”, 他们自称“玛克诺巴(Maknopa)”。见比亚素蒂(Biasutti)戴尼丽(Dainelli)《人种》(I tipi umani)(见《菲力丕意大利书信集》(apedizione Italiana De Filippi) 第二集, vol.x), 博罗纳(Bologna), 1925, 第 33-37 页。参看福兰克《卡拉泽的鞑靼

人》, MASI 1(1906), n.19。

[3] 虽然名称相似, 仍不能确定 Dadikai 就是 Datikhai 托勒密《地理书》, 1.51)将后者定位于恒河上游。

[4] 赫尔曼(A. Herrmann)《丝绸之国与传统光芒下的西藏》(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 莱比锡, 1938, 第 10-16 页。

[5] 希尔卡(D.C. Sircar), 《往世书》民族汇编资料》(Text of the Puranic list of peoples), 见 IHQ 21 (1945) 第 303 页, 《古代和中世纪印度地理学研究》加尔各答, 1960, 第 25 页。

[6] 见比亚素蒂·戴尼丽, 第 262 页。根据比亚素蒂的观点(ibid. 第 259-262 页) 蒙古利雅人的特征普遍存在。戴尼丽坚持认为(ibid., 44) 蒙古利雅人种特征是很次要的, 而拉达克人的血统主要来源于雅利安人。第一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

[7] 关于拉达克鞑靼人首领的传统说法参看富兰克《西部西藏史》(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1907 伦敦, 第 48 页。

[8] 由于印刷原因, 我们特将无法表示出的字母用特定的方式代替。如“s 下点”表示为“[s]”, “t 下点”表示为“[t]”, “n 下点”表示为“[n]”, “m 下点”表示为“[m]”, “r 下点”表示为“[r]”。n 上点=ng。

[9] 克诺(S. Konow)编《卡罗施蒂碑刻》(C , 1) 加尔各答, 1929 年, 第 79-91 页。参见他的《印度——西梯亚(西徐亚)历史年表》(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bology) 见 JIH 12 (1933) 第 36-37 页。拍摄于 1928 年的一张更好的相片, 发表在图齐的《斯瓦特考古发掘的初步报告》

(Preliminary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Swat) 中, 见《East and West》, 9(1958) 第 294 页, 图 8。

[10] 富兰克《西藏西部卡拉泽的历史资料》(Historiche Dokumente von Khalatse in West Tibet) 见 ZDMG 1907, 第 583-614 页。

[11] 《大唐西域记》(Ta-T' ang Hsi-yü-chi) Taishō edition, LI 890a.9 and 892b, 第 12-13 页; 瓦特斯(T.Watters)《玄奘旅行记》(On yuan Chwang's travels) 第 299 页、第 330 页。

[12] 富兰克《秣罗娑考》(Note on Mo-lo-so) 见 JRAS 1908 年, 第 188-189 页。图齐在 1956 年的《关于在尼泊尔两个科学探险队的初步报告》第 94 页中将摩腊娑(Mo-lo-p'o)读作相应的 Mälava(汉文史籍中译为麻罗华)。在《阿达摩经分说》(Abhidharmavibhāṣā)和《罗摩衍那》(Rāmāyana)中将 Mälavas 描述为一个喜马拉雅部落。

[13] 伯希和《马可波罗评注》2 卷, 巴黎 1963, 第 706-707 页。

[14] 伯希和认为“三波诃”是拉达克的库鲁(Kulu)语称谓, 而在克什米尔则称为秣罗娑, 但玄奘的著作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15] 图齐《关于在尼泊尔两个科学探险队的初步报告》, 1956, 第 92-105 页。

[16] 巴柯、托玛斯、杜散整理翻译《敦煌吐蕃历史纪年》, 巴黎 1940 年, 22, 1.13。

[17] 哈拉(E.Haarh)《象雄语》(The Žang-zung language) (Acta Jutlandica, XL, 1), 哥本哈根, 1968, 7。

[18] 《拉达克王统史》, 20.30 及 21.21。见石泰安(R.A.Stein)

启发性的讨论,《汉藏边界的古代部族》(*Les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étaines*) ,巴黎,1959,第51-54页。

[19]哈拉 op.cit. 38。应该谨慎使用印度出版的象雄语资料,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根据喜马拉雅山东部和西部方言,对一种早已死亡的文字的现代重构。见石泰安,《组织化本教的象雄语》(*La langue Žang-žung du bon organisé*) ,见 BEFEO 58(1971),第231-254页。但是 mar 看起来是一个道地的象雄语词。

[20]《敦煌吐蕃大事纪年》中将此记在本年中。该文本发表于巴柯、托玛斯、杜散整理翻译《敦煌吐蕃历史纪年》,巴黎1940年,13、14、15、22、23。译文由波格斯罗夫斯基(Bogoslovskij)、麦克唐纳(A.Macdonald)、达斯(Róna-tas)、乌瑞(Uray)等新近研究予以校正。

[21]《唐书》(百纳本) 221B 5b。《册府元龟》964.12a-b, 964.14b,971.4a。沙畹1903年译本第150及199-200页,以及沙畹1904年译本第33、41-42、44页。

[22]巴柯、托玛斯、杜散整理翻译《敦煌吐蕃历史纪年》,巴黎1940年,第22页。

[23]《资治通鉴》(1957年北京版) 汉文第212页、第6752页。《唐书》216A 8b-9a(伯希和译本第99页) 221B,5b(沙畹1903年译本第150-15及5)。

[24]有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最好版本是哈内德(Haneda) Tōru, *Recueil des oeuvres posthumes* ,I,京都,1957年,第610-629页。此引文见第618页。

[25]见普利布兰克(E.G.Pulleyblank),《内蒙古的粟特侨居者》(*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通报》41(1952),第318页。

[26]巴柯、托玛斯、杜散整理翻译《敦煌吐蕃历史纪年》,巴黎1940年,第25页;《旧唐书》(百纳本) ,196A.10a(伯希和译本第23页);《唐书》216A.10a (伯希和译本第103页);《资治通鉴》汉文本214,6287(沙畹1903年译本第151页)。本教关于此次战役的说法参见霍夫曼(H.Hoffmann)《吉尔吉特

的本教》(*An account of the Bon religion in Gilgit*) ,见 CAJ ,13(1969年),第137-145页。

[27]《旧唐书》,104.1a-2a ;《唐书》,135.4b(沙畹1903年译本第152-153页);《资治通鉴》汉文本215,6884-85。

[28]《册府元龟》999.19a-b(沙畹1903年译本,214-215);《资治通鉴》汉文本216,6897。

[29]《旧唐书》,128.1a ;《唐书》,153.1a ;《资治通鉴》汉文本216,6920-21,参见沙畹1904年译本第88页。

[30]巴柯、托玛斯、杜散整理翻译《敦煌吐蕃历史纪年》,巴黎1940年,第58页。

[31]沙畹,《悟空行记》*L' itinéraire de Ou-K' ong* ,见 J.As ,1895年2,第356页。

[32]《世界境域志》,米诺尔斯基译本,伦敦,1937年,第93、258页。

[33]富兰克(A.H.Francke),《拉达克的石刻文字》(*Felseninschriften in Ladakh*) ,见 SPAW ,1925年,第366-370页;穆勒尔(F.W.K.Müller)《拉达克粟特人的石刻文字》(*Eine soghdische Inschrift in Ladakh*) ,见 ibid. ,第371-372页;本维尼斯特(E.Benveniste)《粟特考》(*Notes sogdiennes*) ,载 BSOAS,9(1937/9年),第502-505页。同一地点还发现了仅有少量词汇的吐火罗文((Kucha dialect)简短碑文,显然尚未公布。

[34]沃格尔(J.Ph.Vogel)曾注意到这点,见 *ASI Report* ,1906年,第32页。

[35]我们仍只有坎宁罕姆(Cunningham)糟糕的目测复制品,见《拉达克的自然、统计与历史》(*Ladakh , physic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伦敦,1854年,第381页。

[责任编辑 索南才让]

[校 对 梁成秀]

Correspondents at Home and Abroad Witnessing the Tibetan Democratic Reform

Zhou Dec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Against some western media's distortion and negative propaganda, this article particularly selects the live interviews and reports by journalists home and abroad in Tibet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form, trying to reveal the historic truth of the reform and prove by facts the great value of this Tibetan democratic reform. Meanwhile, this article preliminarily reveal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Key Words: Tibet; democratic reform; interviews and repor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Tibetan Populace Being the Important Beneficiary of the System Transition

Mao Yangha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By economic comparis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great changes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Tibet since the 50 years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proving that the people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in Tibet are the beneficiary of the system transitio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ociety is fully manifested in Tibet.

Key Words: system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Kingdom Ladakh: 950--1842 --Early History of Ladakh (Italian) Luciano Petech

Translated by Zhaluo, Revised by Peng Zhiy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100081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here are few documents about the birth of the kingdom Ladakh in the 10th centu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seek some current materials related to Ladakh, but not waste time on refuting the groundless utterances which has already been disproved.

Key Words: Ladakh; Tatars; Baltistan; Tubo